

吉林省“三地三摇篮”红色遗产的内涵 与时代价值阐释

宋德风, 乔银鹏

东北电力大学, 吉林 吉林 132000

DOI: 10.61369/SSSD.2025130036

摘 要 : 近年来, 吉林省基于其丰富的革命和建设历史, 系统化地凝练并提出了“三地三摇篮”这一核心“红色标识”。这一概念是一项深思熟虑的文化品牌塑造行动, 旨在将吉林省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关键角色进行系统化、符号化的整合与传播。其核心构成包括了奠基新中国的“三地”——东北抗日联军创建地、东北解放战争发起地、抗美援朝后援地, 以及支撑国家现代化的“三摇篮”——新中国汽车工业、电影事业、人民航空事业。此举的战略意图在于强化区域文化认同, 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系统教材, 并为区域红色旅游的特色化发展奠定坚实的文化主题基础。

关 键 词 : 红色遗产; 三地三摇篮; 时代精神

Connotation and Era Value Interpretation of Jilin Province's "Three Places and Three Cradles" Red Heritage

Song Defeng, Qiao Yinpeng

Northeast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Jilin, Jilin 132000

Abstract : In recent years, Jilin Province has systematically refined and put forward the core "red sign" of "three places and three cradles" based on its rich revolutionary and construction history. This concept is a well-thought-out cultural brand shaping action, aiming to systematically integrate and disseminate the key role of Jilin Province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hinese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s core components include the "three places" that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new China – birthplace of the Northeast Anti-Japanese United Army, the starting place of the Northeast Liberation War, and the support base of the War to Resist US Aggression and Korea, as well as the "three cradles" that support national modernization – the new China's automobile industry, film industry, and civil aviation industry. The strategic of this move is to strengthen regional cultural identity, provide systematic textbooks for patriotic education, and lay a solid cultural theme foundation for the distinctiv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red tourism.

Keywords : red heritage; Three places, three cradles; spirit of the times

一、奋斗与牺牲的谱系：解构“三地”

(一) 东北抗日联军创建地：不屈抵抗与民族救亡精神

吉林省作为东北抗日联军斗争的主要舞台和创建地, 其历史地位不可替代。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组建抗日游击队, 到1934年在临江县(今属白山市)正式提出“东北抗日联军”的名称, 再到磐石红石砬子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吉林见证了这支英雄部队从孕育到壮大的全过程^[1]。杨靖宇、魏拯民等抗联将领在白山松水间浴血奋战的事迹, 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二) 东北解放战争发起地：决战决胜与战略转折精神

吉林省是决定东北乃至全国命运的解放战争的发起地和关键战场。1946年底至1947年初, 著名的“四保临江”与“三下江

南”战役在吉林大地上打响, 这两场战役的胜利, 从根本上扭转了东北战局, 使东北民主联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被誉为“东方马德里”的四平, 先后经历了四次惨烈的鏖战, 其最终解放标志着中共在东北战场上掌握了绝对主动权。这一时期形成的精神, 核心在于高超的战略智慧、灵活的战术运用, 以及为夺取决定性胜利不惜付出巨大牺牲的决战精神。例如, 四战四平中人民军队的巨大牺牲彰显了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战的坚定决心^[2]。

“东北解放战争发起地”代表了第二个历史阶段——为建立新政权而战。它实现了从抵抗外来侵略到国内革命建国的历史性跨越, 是谱系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这种从“存亡之战”到“定鼎之战”的飞跃, 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 更是政治上对新中国成立的奠定。它承载了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关键转折功能, 是联结民族生存与政权建立的战略性枢纽^[3]。

（三）抗美援朝后援地：全民奉献与国际主义精神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省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后方”和稳固的后援地。集安、临江等地是志愿军入朝作战和物资运输的主要通道^[4]。战争期间，吉林全省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动员，超过2.8万名青年踊跃参军奔赴前线，全省人民通过增产节约和捐献运动，累计捐献可购买47架战斗机的款项。同时，吉林还承担了繁重的战勤任务，组织了超过81万人次的民工支援前线，救治安置了数十万伤病员和过境人员。

这一时期彰显的精神是“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军民一心的团结精神和无私奉献的牺牲精神。体现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面对外部威胁时，能够迅速动员全社会力量，形成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的能力^[5]。通过对“三地”的分析，一个清晰的叙事逻辑浮现出来。它们并非三个互不相关的历史片段，而是一个连续统一、层层递进的现代国家建构史诗。吉林省在这一完整过程中始终处于核心舞台，这使得“三地”的提法超越了地理标签，成为一部浓缩的建国史。这种内在的逻辑统一性，正是其能够构成一个连贯“精神谱系”的根本原因。

二、创造与开拓的谱系：解构“三摇篮”

新中国汽车工业、电影事业和人民航空事业这三大“摇篮”，标志着吉林从革命的战场转向了建设的热土，将革命精神成功转化为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

（一）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自力更生与工业开创精神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立，是新中国工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作为“一五”计划的重点项目，一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汇聚了全国力量，建设者们以“建厂就是战场”的口号和革命战争年代的热情，克服了技术、物资和经验上的重重困难，展现了中国人民建设现代化工业强国的雄心与能力。最终，一汽于1956年7月生产出第一辆“解放牌”卡车，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随后，1958年又研制出第一辆“东风牌”轿车和“红旗牌”高级轿车，成为国家工业化成就的象征。一汽的建设与发展，孕育了以“艰苦创业、自力更生、工业报国”为核心的工业开创精神。在精神谱系中，“汽车摇篮”标志着从军事斗争向经济建设战略转移，它是建设现代化、工业化新中国的第一块重要基石，成功构筑了国家“硬实力”的起点^[6]。

（二）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人民文艺与文化建国精神

长春电影制片厂（长影）的前身东北电影公司成立于1945年，是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基地。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长影创作了《白毛女》《上甘岭》《英雄儿女》《五朵金花》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经典影片，深刻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和集体记忆。长影精神的核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针。电影在这里不仅是艺术，更是进行思想教育、传播主流价值观、构建新的国家文化认同的重要工具。“电影摇篮”代表了国家建设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维度，它与一汽的工业建设相互补充，共同构筑了新中国的“软实力”和民族魂魄，是新政权意识形态建设中不可或缺的文化篇章。

（三）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艰苦创业与向天图强精神

1946年3月在吉林通化成立的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是中共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被誉为“人民空军的摇篮”。在“马拉飞机”、缺少燃料和教材、没有中级教练机等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老航校的创建者们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创造了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迹，培养出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和航空技术人才。为人民空军、民航事业乃至航天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这种精神是革命英雄主义在科技攻关领域的延伸，体现了新中国向高科技领域进军的决心和勇气。“航空摇篮”是军事斗争传统的继承与升级，代表了国家建设在国防科技领域的制高点，象征着民族复兴从陆地走向天空的更高追求。

进一步审视“三地”与“三摇篮”的关系，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共生关系，是一种精神的延续和转化。更重要的是，在“三地”的战火中锤炼出的不畏艰险、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被完整地、无缝地注入到了“三摇篮”的建设中^[7]，他们的精神内核是一致的。因此，“三摇篮”可以被视为“三地”革命精神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具体化和产业化体现。从为国家“生存”而战，转变为为国家“发展”而建。正是这种精神上的血脉相连，使得“三地三摇篮”超越了两个独立的类别，构成了一个从革命到建设、从牺牲到创造的完整精神谱系。

三、价值逻辑的内在统整

（一）一部完整的民族复兴叙事

综合分析，“三地三摇篮”共同构成了一个逻辑完整、内涵丰富的系统，它生动地叙述了吉林省在中共的领导下，从求生存到谋发展、从奠基业到开新篇的辉煌历程。这一叙事弧线清晰而完整：始于抵抗外来侵略以求民族生存，发展到通过国内革命战争建立新的国家政权，最终升华为在国际斗争中捍卫新生国家的主权与尊严。随后，国家转向和平建设时期，在工业、文化和国防科技三大领域奠定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基础^[8]。这种内在的逻辑统一性，使得“三地三摇篮”超越了区域地理标签，成为一部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史诗的微缩样本^[9]。

（二）时代价值

在新的历史时期，系统阐释和弘扬“三地三摇篮”这一价值体系的内涵，对于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这种价值的体现，不仅在于对历史事件的简单纪念，更在于其在意识形态、区域经济和精神激励三个维度上对现实的战略赋能。

这一历史标识为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四史”学习教育提供了系统化、生动、本土化的“活教材”。这种系统化的叙事将宏大的历史进程与受众切身的乡土情感联系起来，有助于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具体而深刻地理解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通过历史的纵深感和地方的具象载体，实现情感共鸣与认知深化，进而增强文化认同和民族自豪感^[10]。这一价值逻辑的核心在于培根铸魂，为新时期的建设者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原动力，是维护社会意识形态统

一性和稳定性的有效手段，确保理论和历史在区域内得到广泛而深入的认知。

四、总结

对“三地三摇篮”精神谱系的深度理解，并非纯粹的学术探讨，它为吉林省红色遗产的传承与利用提供了根本遵循。它确立

了文旅融合发展的“魂”与“纲”。未来所有围绕“三地三摇篮”展开的旅游开发、教育活动、文创设计、数字传播等实践，都应以此谱系所揭示的内在逻辑和精神内涵为核心指导。确保相关活动不仅仅停留在表面的符号消费，而是能够真正触及历史的温度与精神的深度，实现红色文化的真实传承与有效传播，避免其在商业化浪潮中被“空心化”和“娱乐化”，从而真正发挥其培根铸魂、启迪未来的时代作用。

参考文献

[1] "三地三摇篮"——吉林的红色标识 [N]. 吉林农村报, 2021-10-21(002).

[2] 史守林. 用好红色资源赋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吉林 [J]. 新长征, 2023(3): 45-49.

[3] 胡静, 鲁春旭. 凝聚与承传: 吉林省域红色文化特色、内涵与价值阐释 [J]. 白城师范学院学报, 2022, 36(6): 16-22.

[4] 刘杨. 文化记忆理论视域下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思考 [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22(6): 117-123.

[5] 吴建华. 东北地区红色文化遗址空间分布特征及保护对策研究 [D]. 延边大学, 2022.

[6] 王越. "三地三摇篮"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实践教学研究 [J]. 中国军转民, 2025, (18): 190-192.

[7] 王珏琦, 于洋涛. 吉林省"三地三摇篮"红色文化对新时代青年价值观的影响研究 [J]. 中国军转民, 2025, (18): 166-168.

[8] 宫月丽, 宫寒冬. 从知之到乐之——将"吉林省三地三摇篮"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 [J]. 作家天地, 2025, (17): 169-172.

[9] 王倩. 数字化创新设计赋能"三地三摇篮"红色资源活化研究 [J]. 大观, 2025, (05): 3-5.

[10] 泽枫, 张雷. "四史"教育赋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路径探赜——基于吉林"三地三摇篮"红色标识 [J].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 2024, 45(07): 69-74.